http://dx.doi.org/10.21186/IPR.2016.1.2.121

由《漂海録》看中国文化传承的分析

최창원(崔昌源)*
청운대학교 중국학과 교수(青雲大學校 中國學科 教授)*

Thorough Analysis of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Based on *Pyohaerok*

Chang Won Choi*
Dept. of Chinese, Chungwoon University*

요 약 文化传承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行为意识和社会制度有着巨大的影响，对一个民族的自我发展与自我完善作用重大，它是其自我教育与自新的必备良药°不当的文化传承是灾难性的，会让一个民族的发展陷入无所适从的乱局，只有好的文化传承才可使其常常自醒，自我修正，永葆生命的活力°本文以『漂海录』为视角，分析了中国几千年文化传承的不均衡状况：许多优良的传统大多从生活中消失或没有完整地传承下来，如博大精深的儒家礼仪，古代精湛的建筑和织锦艺术，先进的造船技术和其他众多的科技发明，相反太多丑恶的文化垃圾却一传再传，大行其道，如只讲形式而不讲内容的管理模式，仗势为患，轻视科技发明和普遍信奉鬼神等°本文重点论述不良文化传承及其对中国发展的影响，即使得中华民族的发展日趋滞后°文章最后提出了作者自己关于重振文化传承的一些系统，以资人们思考°

주제어：《漂海録》，文化传承，行为意识，自我完善，不均衡，优良传统

Abstract Cultural heritage means a great lot to a nation's social system and its people's behavior consciousness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ts self-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It is essential for a nation's self-education and renewal. Improper cultural heritage will be disastrous because it may fall a nation into a loss of terrible chaos. Only the proper cultural heritage can make it always self-awaking, self-correcting and remaining vital in life. This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oi Bu's Pyohaerok, makes a thorough analysis of the unbalance heritage of Chinese ancient culture for thousands of years. For example, many fine traditions gradually vanished in our actual life or only take half their life in heritage nowadays, such as our ancient broad and profound Confucian etiquette, ancient exquisite brocade art and architecture, ancient advanced ship-building technology and many other advanced numerous technological inventions; however, too much unwanted cultural rubbish keeps constant prevailing and takes repeated successions in the life, such as the heavy-form-and-light-content management mode, borrowing power to do evil, neglecting technological inventions long time and generally believing in ghost theory,etc.. This paper mainly focuses on the partial successions of the bad cultural heritage and its bad influence on the country, and concludes that it is just that that makes the country more and more backward. Therefore, the paper makes some pondering over these issues and proposes some related ideas of country-building to attract others participation to deal with them.

Key Words : "Piaohailu",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and natu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and other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and themselves, harmonious

Received 11 July 2016, Revised 15 July 2016
Accepted 18 July 2016

ISSN: 2466-1139

© Industrial Promotion Institue.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is an open-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terms of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Non-Commercial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3.0), which permits unrestricted non-commercial use, distribution, and reproduction in any medium, provided the original work is properly cited.

一、序言

1488年（明代弘治元年，朝鮮成宗十九年），朝鮮弘文館副校理崔溥自濟州島返里奔父喪，途中遇風暴，与同船42人漂流大海14晝夜，水盡粮絶時漂到中國宁海与臨海之間的牛頭洋登陸[1)]，受到宁海軍民的友好接待。他們一行后經宁波、杭州，沿京杭大運河到達北京，最后過鴨綠江回國。在中國逗留135天，行程4000多公里。崔溥回國后，用中文寫成了14.2万字的《漂海录》，書中有大量關于当時中國的海防關隘、運河城市、山海風光、地志民俗等記載，對研究中國古代的海防、政治、運河、城市、地志、民俗以及中朝兩國關系等，皆具很高的參証价值。陪同崔秉一先生（崔溥先生的后裔）的北京大學教授葛振家說："崔溥的《漂海录》可以說是歷史上記述中國最好的一部書。"遺憾的是，其在中國却鮮有人知。從書中，我們看到既有對明代中國自然美景和人文美景的描繪，也有對政治活動和地方風俗文化方面的記录，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古代中國在外國人眼中的眞實寫照。此前的很多著作或論述分別從《漂海录》的語言特色、其中所反映的京杭運河的歷史作用、南北風俗文化差异或者明朝的海防等方面進行過研究，對于其中反映出的文化傳承狀況還沒有專門研究。本文專門探討《漂海录》中所透露出來的中國古代歷史文化傳承方面存在的問題，即歷史文化傳承的不均衡性。許多优良的傳統大多從生活中消失或沒有完整地傳承下來，如博大精深的儒家礼儀，古代精湛的建筑和織錦藝術，先進的造船技術和其他衆多的科技發明，相反太多丑惡的文化垃圾却一傳再傳，大行其道，如只講形式而輕內容的管理模式，仗勢爲患，輕視科技發明和普遍信奉鬼神的習慣等。本文重点在研究后者這种不良的文化傳承。從這一課題入手，希望能從其中條分縷出一些對于中華民族持續發展有益的東西，以資國人思考，継而能爲國家的未來發展有所帮助。

二、《漂海录》反映的中国文化的传承情况

在《漂海录》中，作者對于天朝的遼闊、繁榮、先進以及中國人的熱情、友善、寬容等优秀民族文化自然是大加贊譽，但他并沒有把中國描寫成朝鮮人心目中的烏托邦，而是同時對于一些歷史文化的陳貴陋俗也進行了揭露：如"國法甚嚴"但又政令不暢；有些官員爲逃避責任虛報、瞞報；受寵者常横行霸道；民間优秀的創造發明不能有效的傳播并發揚光大；信奉鬼神之气日盛。

可以看出，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傳承并不均衡：有些糟粕性的反而流傳很久，而一些优秀珍貴的歷史文化傳統却被当政者置若罔聞，使其自生自滅。

1) "国法甚严"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宋成有在其〈從<漂海录>看崔溥的中國觀〉中[2)]，也提到了"國法甚嚴"，但他用了引号。說明是否國法甚嚴或者只是形式上嚴而實質上不嚴還有待商榷。

事例一：原來倭寇屢犯中國邊境，有守寨官欲誣我（崔溥一行）爲倭求取大功有很多漂流人士，入中國因无牌无信函，被誣倭邀功而殺。[3)]

我國人爲公爲私往來濟州，或遭風无去處者不可枚悉，終能生還者，十百僅一二，是豈盡沉于海波乎？其漂入島夷如遲羅、占城之國者，无夏望還，雖或漂入中國之界，亦爲邊人所誤，誣以倭賊，折首受賞，則誰能辨其情乎？如臣等者，若不先自下陸，若无印牌之信，豈夏免于禍哉？

閏正月28日，是日大雨。護送我們的翟勇一行來到奉化縣連山驛止宿。有一人自外至，横怒肆毒，臣等惴惧奔匿，勇及驛丞，俱被辱焉。勇謂臣曰："外有一人說你是劫賊之人，阻擋驛官不要供給，我与他說汝是讀書君子，他夏肆暴。你可寫狀，告他搶去衣包云云。"

事例二：正因爲"國法甚嚴"，所以錯了也要將錯就錯，不宜修改，以免惹出事端

閏正月22日，在桃渚所，把總官讓臣改寫昨日招詞，把下山遇賊，仙岩驅擊等事删去，另寫。我不愿，認爲供詞当以直，去實就虛，不妥。薛旻密言，今皇帝新位，法令嚴肅，見實恐他以爲盜賊盛行，歸罪邊將，非細事也。爲你計，当以生返本國爲心，不宜好爲生事也。臣聞其言以爲然，從之。

1)金賢德，〈崔溥飄海登陸点与行經路線及漂海录〉，《浙江海洋學院學報》（社科版）2006年，第22頁。

2)宋成有，崔昌源，從《漂海录》看崔溥的中國觀，中國語文論譯業刊，中國語文論譯學會，2012年，第268頁。

3)朴元熇，崔溥《漂海录》譯注，高麗大學校出版部，2006年，第370、371頁。

2月初4日，在紹興府，崔溥又受到總督備倭署都指揮僉事黃宗等三名官員的會審。崔溥据實添加了“下山逢賊，仙岩遇杖”等內容，對照劉澤呈送的供詞，三官員警告崔溥“供詞有違，汝實有罪”，要求“汝宜謄寫前辭，无一字加减”。他們還告誡崔溥到杭州、北京“亦以是答之，稍有相違，大不可也”。這樣從程序上看來，环环相扣，毫无差失，實際上与實情不符。

2月初8日，在杭州。顧壁來，謂臣曰：“今听說，將你等事差人星夜馳奏北京，直待回報，方放回。國法甚嚴，律條甚重，遺漏夷情，新例充軍，凡我所言，不可与人見，只可自知。”

4月初1日，晴。鴻臚寺主簿李翔來謂臣曰：“今日兵部將你事入奏，你可寬心。漂流事，当報礼部，浙江三司直報兵部，不報于礼部，故礼部入朝罪他，兵部已杖指揮楊旺二十”云云。既然國法甚嚴，又豈能報錯，路上情况千變万化，楊旺亦不能保証如期到達，錯報及遲達直怪楊旺，是否處罰得当？

据上述材料可見，“國法甚嚴”更多的只是流于表面，實際上存在的問題還有很多，如虛報領賞，瞞報避責，處理問題只解決表面，對楊旺的處罰就是他在代人受過。

2) 宦官仗势乱为

宦官也称太監，中國古代被閹割后失去性能力而專供皇帝、君主及其家族役使的官員。隨着封建專制制度走向頂峰，宦官專政的程度和危害也越來越深。秦漢時宦官開始掌握政權，唐朝以后進一步控制軍權,明朝則從中央到地方、軍政刑財獄无所不包。宦官制度始于周代，当時宦官人數不多，是家臣的一部分，主要担負看守宮門、傳達命令、侍奉起居等雜役，地位低賤。但由于宦官侍君側，容易得到君王的寵信，故能對君主施加某些影響，甚至參与到政治活動中去。

朱元璋称帝后，頒發《大明律》，重典治國，嚴禁太監宦官干政，違者斬首示衆。成祖朱棣奪位，設東厂命宦官監視內外臣工，賦予心腹宦官巡海、巡邊，出使外國的權力，太監勢力漸次坐大。朱棣之后諸帝，昏庸无能，荒誕不經或長期不理朝政者不乏其人，就形成了太監弄權的荒唐政局。

在《漂海彔》中，也有這些事實記彔。

3月初8日，崔溥一行在兖州魯橋驛運河橋閘，親眼目睹“太監姓劉者封王進京，其旌旗甲冑、鐘鼓管弦之盛，震蕩江湖。及是閘，劉以彈丸亂射舟人”。崔溥也斥之“狂悖如此”。与崔溥同行的官員傅榮解釋說“太上皇信任宦官，故如此。刑除人，持重權爲近侍，文武官皆趨附之。”陳萱曰：“此舟中內官，如此歪爲。”崔溥說：“在朝鮮，內官只任宮中掃洒傳命，不任以官事”。這表現出他對于宦官当道也极爲不滿。[4]

《漂海彔》中的太監姓劉，疑應爲劉瑾，因爲劉瑾是大明朝除了后來的宦官魏忠賢之外另一个惡名昭著的太監。但劉瑾在孝宗時并不得志，史載“孝宗時，其坐法当死，得免。”只有在武宗時才得勢。[5]由此看來，這里所說的“封王進京者”應該是另有其人。但不管是誰，他終究反映出太監当道的惡俗。

宦官弄權在中國可以說沿襲了几千年，不但明朝之前有，明朝有，明朝之后的清朝也難逃其禍。難道中國人不知其危害？答案无疑是否定的。据歷史學家介紹，用宦官在宮內供驅使，中外歷史上都曾經有過，在古代奴隶制時期的埃及，希腊、羅馬、波斯等文明古國都出現過宦官，而且当時其活躍程度不亞于中國，但上述這些國家的宦官，均較早地退出了歷史舞台。而中國的宦官制度發展持續到明代，成爲一整套完整的運作机构，中國的宦官制度產生之早，延續之久，組織之嚴密，影響之盛大是世界歷史上少有的。宦官是封建制度的特有產物，他們的持續亂政，對中華民族是一个又一个的惡夢。

3) 民间发明得不到重视

《漂海彔》中有這樣的記彔:

3月23日，過靜海縣。[6]臣謂傅榮曰：“愿學水車之制。”榮曰：“你于何地，見所謂水車乎？”臣曰：“向者過紹興府時，有人在湖岸運水車，以灌水田，用力少而上水多，可謂当旱農稼之助。”榮曰：“其制，木工所知，我未之祥。”

臣曰：“昔嘉佑中，高麗臣屬毛羅島人，檣摧桅折，風漂抵岸，至蘇州崐山縣，知縣事韓正彥犒以酒食，見其旧桅植舟木上不可動，使工人爲治桅造轉軸，教以起倒之法，其人喜，捧手而輾。毛羅，今我濟州也。我往濟州，

4) 朴元熇，崔溥《漂海彔》譯注，高麗大學校出版部，2006年，第413、414頁。

5) 張廷玉等，白話明史《劉瑾傳》，現代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頁。

6) 崔溥《漂海彔》譯注，高麗大學校出版部，2006年，第424頁。

見漂來此，亦与其人一般，足下亦以韓公之心爲心，教我以水車之制，則我亦捧手而喜。”榮曰：“水車只用汲水而已，不足學也。”臣曰：“我國多水田，屢値干旱，若學此制，以教東民，以益農務，則足下一唇舌之勞，可爲我東人千万世无窮之利也。”榮曰：“我姑思之。”

同爲官宦，但對待同一事物的態度迥然不同。崔溥看到水車，馬上就想到要去學習，以便于回去推广給需要的万民。而傅榮看到，就覺得非常平常，沒有進一步的細想它可能會給万民帶來更多的帮助。

這說明中國古代的一般政府官員根本不重視民間的發明創造，更難會想到去大力推广。他們對于民間的發明創造，只是任其自生自滅。相反，韓國官員就能把所學帶回國后推广開來，使更多需要者受益。

想想看，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造紙、火藥、印刷和指南針）都居世界之先。四大發明不僅僅是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繁榮的標志和中國人民聰明智慧的体現，更重要的是它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人類近代文明發展的進程。換句話說，如果沒有中國古代的四大文明，也許人類社會就不會是今天這个樣子。中國的四大發明，通過阿拉伯人傳到歐洲之后，對歐洲社會産生了巨大的影響，從而影響了整个人類社會的進程。對此，馬克思曾經這樣高度評价，說這是預告資産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他少說了一項。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産生了殖民地，印刷術變成了宣揚新教的工具。總的說來，它們變成了科學夏興的手段。但是，爲什么非得要傳到歐洲才有如此大的作爲呢？科技在中國本就有很好的基础，爲什么不能錦上添花？

良好的文化傳統和發明創造沒有得到有效的宣傳推广和延續是非常可惜之事，中國并不是每个后人都對那些發明的原理和制作方法了如指掌。下面是近年來中國在加大農業教育与技術推广方面的一些論述：我國農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普遍不高，全國農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僅6年多。1997年農民家庭勞動力中文盲或半文盲的比重仍高達10%，高中、中專程度的勞動者也僅占10%。整体來看，農民對科學技術的吸納能力較弱。對于大多數農民來說，僅僅停留在只給他們提供農業科技信息資料是遠遠不够的，還需要通過試驗、示范，進行言傳身教，才有可能使農民眞正地掌握好農業技術。[7]

從明朝至今500多年來，這种農業落后的狀況還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這与当權者對于民間科學技術的發明創造長期沒有給予必要的重視和缺乏有效的推广不无關系。

4）封建迷信活动经久不衰

過度信奉封建迷信在中國已有很長的歷史。它的傳承可以說是一代一代，綿延不絶。在崔溥的《漂海彔》中，短短135天的行程就經歷好几次這樣的事情。

事件一：2月27日，過淮安府。傅榮和趙鑒語臣曰：“此山足有神物，狀如獼猴，縮鼻高額，青軀白首，目光若電。諺傳：‘大禹治水時，以大索鎖此物，命住于此，俾淮水安流。’今人有圖此物之形者，免淮濤風水之難。”臣曰：“此眞怪誕不經之說，不足信也。”鑒默然。

事件二：3月10日至開河驛。楊旺与其徒入廟中，焚香礼神以祭，令臣等亦拜。臣曰：“祭山川，諸侯事，爲土著人者，特祭祖考耳，少逾其分，非礼也，非礼之祭，爲人討，神不享[8]，故我在本國，不敢拜山川之神，况可拜异國之祠乎？”陳萱曰：“此祠，乃龍王祠也，有灵迹，故過此者，皆致恭祭拜，然后行。不然則必有風濤之險。”臣曰：“觀于海者難爲水，我已經數万里大海暴濤之險，若此中土江河之水，不足畏也。”語未畢，萱告于旺曰：“此人不要拜，亦不可屈其志”云云。

事例三：3月22日，過興濟縣，至乾宁驛。驛前有巨家，陳萱曰：“此新皇后張氏之私第也。初，新皇帝爲皇太子時，欽天監奏：‘后星照河之東南。’先帝命選河東南良家女子三百余人，皆聚京師。先帝与皇太后更選，張氏中選，封爲正后。后之祖，知鳳陽府，父无職，旧爲國子監生，今特拜爲都督”云。

封建迷信，若作爲一种輔助文化，供人們在日常生活之余娛樂一下，尙可接受。但是如果鄭重其事，過度推崇，甚至据此裁定事物，未免失去正常理性主宰。有些地方，爲了封建迷信，不惜揮霍重金，可在干實事，解決實際問題時却拿不出應有的資金。有些寺廟的香火越來越旺，焚燒的香木越來越粗，越來越長，价錢也日趨上漲，成了无良寺廟借机斂財的工具。還有的个人因爲相信封建迷信而致他人死亡，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7) 黃季焜，讓科學技術進入農村的千家万戶--建立新的農業技術推广創新体系,《農業經濟問題》, 2000年，第3頁。

8) 崔溥《漂海彔》譯注，高麗大學校出版部，2006年，第416頁。

三´ 文化传承不均衡原因透析

1) 统治者高高在上，唯我独尊

明朝實行高度集中的皇權專制，在廢除宰相制度后，形成了一定的權力眞空，這极大地削弱了朝臣的政治力量。君主對于宦官的偏袒，使他們在一定程度上變成了君主的“代言人”。皇上高高地凌駕于一般朝臣之上，宦官无形中也就有了一种特權。在明代君主往往是更信賴和倚重“身邊之人”---宦官，因此對于宦官目无法紀，爲非作歹之事能够包庇縱容，甚至對于宦官与朝臣之間的矛盾爭端也經常選擇站在宦官一邊[9]。由于宦官常侍君側，容易得到君王的寵信，能對君王施加某些影響，甚至參与到政治活動之中，這也許就是所謂的近水樓台先得月了。

宦官對于皇帝的忠誠也是一个讓皇帝很寵信他們的重要的因素，因此宦官好像也高高在上。清朝末代皇帝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叙述：“講我的幼年生活，就少不了太監。他們服侍我吃飯、穿衣和睡覺，陪我游戲，伺候我上學，給我講故事，受我的賞也挨我的打。別人還有不在我面前的時候，他們却整天不离我的左右。他們是我幼年的主要伴侣，是我的奴隶，也是我最早的老師。”可見，皇帝一般都已經把太監看成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認爲是自己的奴隶。說太監不好就好像在說皇上不好，因此太監專權的根源就不言而喻了，宦官驕横与皇權至高无上息息相關。皇權得不到約束，太監專權就很難根除，這也是爲什么几千年來宦官專權能够代代傳承的根本原因。

2) 注重统治秩序，漠视科技发明

中國帝王都是人治的信奉者。几千年間，中國專制制度的框架和運轉規則沒有根本性的突破和轉型。統治績效如何，更多地依賴于統治者个人的精神振作与否。沒有內外條件的嚴厲制約，个人的英明与自制无法抵制环境的縱容与腐蝕。[10]

爲鞏固大一統封建專制統治的需要，古代統治者重視社會秩序和倫理道德的教化，對于民間科技發明不是很重視。中國古代人分四等，發明創造的主力“工”這个階層僅位于第三等，缺乏應有的社會地位，而科擧考試又爲他們提供了成爲“士”的可能，所以發明了技術的“工”就不可能繼續潛心研究，把技術延伸到科學理論層次。科擧考試不設“工科”內容，自然也就不會引起考生對科技的重視。再者，統治者也不重視科學技術的發展繼承力。許多先進科技成果一再失傳，不止一次的重复研究，這也成了古代科學發展的致命缺陷。

另外，古代中國對民間研發力量只見限制，不見支持，是常有的現象。民間發明始終沒有獲得朝庭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僅僅在使用方面，獲得了朝庭對其科技需求的短期認可，隨之而來，沒有獲得過學術普及与持續傳承并不斷發揚光大的机會。而在國外，許多重大的科技成果均是民間發燒愛好者創發的，如飛机由美國的萊特兄弟等發明，政府只對他們提出性能要求指標和預訂，訂單支持即可。明朝朱元璋還在限制十戶才可擁有一把菜刀時，西歐的民間手工業者已進入研制熱兵器的時代，這才有了西方的堅船利炮及火槍打敗中國保守政府的后果。如果当初政府政策開放一点，中國民間的研發愛好者決不會敗于西方之手。中國對于任何民間的事情都喜歡横加管束，而不施以積极支持，這也許是中國原創科技嚴重不發達的內因。半个多世紀前，英國學者李納約瑟提出了這樣一个問題，″中國古代有杰出的科學成就，何以近代科學崛起于西方，而不是中國″？這就是著名的李約瑟難題，也称″中國難題″。多少年來它讓人費解，受之困扰。中華民族成就了不少發明創造，爲人類文明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貢獻，自己爲什么總是走不出國富民强之道呢？這确實值得深思。[11]

現代有西方學者認爲，除造紙有明确的証据証明是由中國傳到西方，其他三項發明并无直接証据表明是由中國傳入西方的。他們以爲，火藥、指南針和活字印刷爲中西方各自獨立發明。中國方面在時間上早于西方，但傳播不广，亦缺乏改進。西方雖時間上晚于中國，但傳播广泛，精于改進，且后亦重新傳入中國。后世使用的火藥、指南針和活字印刷是直接是從西方發展而來的。[12]

早于西方，但傳播不广，這足以說明，中國几千年來的統治者，只在乎自己的政局穩定，對于爭權奪利，互相傾斗熱衷异常，而對于民間科學技術的推广應用，缺乏熱

9) 牛雁峰，明代宦官干政對國家經濟的破坏之研究，西北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12年，第15頁。

10) 張宏杰,《飢餓的盛世》，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頁。

11) 張柏春,智慧的回響：盤点中國古代重要科技發明創造,光明日報，2015年，第1頁。

12) 布魯諾.雅科米(法)，《技術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41頁。

情，沒有作爲社會發展的重点。正如在崔溥要求傅榮教給他怎么樣制造水車時，傅榮說自己也不淸楚。一个社會缺乏讓大多數普通人中的优秀人才發揮潛力的机制－－平等机會，缺乏解放普通勞動者的發明思想－－奬勵發明制度，卽使其民間的創造發明再多，也難构成合力，而且只會在創造發明的低層次盤旋。沒有系統理論和基础學科支撑的民間發明，最終很難躋身于世界文明高速發展的軌道。

3) 各种乱象使迷信难除

世界上沒有无宗教、无巫術的民族，不論該民族是多么的原始。在所有的原始社區內，有兩个顯然有別的活動范圍同時并存，一种是巫術和宗教活動范圍，一种是科學的活動范圍。[13]

可見，封建迷信的存在有它的先天必然性。在人類發展之初，由于對外界环境知之甚少，形而上學的唯心論，自然會占主流，認爲科學是旁門左道，這是封建迷信存在的原動力。例如早期人們認爲地球是水平的一片陸地爲水包圍，但隨着自然科學的不斷發展，人們的認識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事實最終証明地球實際上是圓形的。因此宗教迷信的外衣就應該逐漸退去，迷信的權威應該走向淡化。

但任凭科學怎么發展，有些統治者還是要抱殘守缺，帶頭大興各种大型祭祀活動[14],全國大小官員上行下效，對國家財力、物力和人力造成了很多无謂的消耗。使得作爲人類文化糟粕的封建迷信在中國能够傳承很久，也正是這些政治引導，讓百姓失去了一些辨別能力。

愚孝也是對封建迷信推波助瀾的一个潛在因素。孝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之一，在中國長期的歷史發展進程中發揮了重大的作用。[15]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孝”是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所共同尊崇的一切行爲准則和倫理規范。什么是“孝”呢？《說文解字》中：“孝，善事父母者。從老省，從子，子承老也。”[16]但是，統治階級爲了維護自己的封建統治秩序，想以孝勸忠爲目的或者是一部分思想家對于孝産生了曲解，愚孝就自然而然或者大張旗鼓的出現了。例如神异灵驗的孝感傳說就對普通人産生了强烈的誤導，如“臥冰求鯉”、“孝感動天”和“賣身葬父”等等荒誕不經的故事，渲染了孝行的上天感應。更有甚者，還捏造出河神，認爲年年發大水造成水灾是因爲沒有及時給河神送童男童女等。

另外，學術界的一些有意无意的誤導，也是封建迷信從我們實際生活中揮之不去的內在根源。《中國宗教報告2009》里邊的內容大概可以分爲兩類，一是關于各大宗教的發展趨勢報告，二是專題報告。[17]全書最令人感慨的是一篇〈從“封建迷信”到非物質文化遺産：民間信仰的合法化歷程〉的文章。講述近百年來中國民間信仰由非法的封建迷信，到合法的非物質文化遺産的身份轉換，不僅令人唏噓，更反映了整个世界文明走向的重大轉型。這篇文章也許很有創新性和學術价值，但如果眞是非法的封建迷信，那就堅決不可以合法化。這樣奪人眼球的標題很容易讓人對封建迷信産生好感。

不問蒼生問鬼神，對宗教的盲目、迷信与過于虔誠，是一种精神上的幼稚可笑、自我陶醉与自我壓抑，更是統治階級爲了麻木人心，提供給百姓的精神鴉片。

四′ 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及带来的反思

這种古代文化傳承中的不均衡，甚至可以說是嚴重畸形的傳承，切實影響到了中華民族的自强自立，徹底摧垮了中國在外國人眼中的良好印象。[18] 1894年至1895年的甲午戰爭之后，中國戰敗，簽署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引發了韓國學者否定中國文化的浪潮。他們認爲是儒家思想文化貽害了中國也貽害了韓國，使自己變得落后。這還是在跟中國有着密切歷史文化淵源的韓國，在其他國家的境況如何就很難預料了。

“國法甚嚴”，如果只是了長期流于形式，而不是實實在在的內容，那就只是頭痛医頭、脚痛医脚的應急招式，必將對國家的長治久安帶來非常負面的影響。首先，它對于人們的自信心是一种嚴重的打擊。古兵法云：“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我們不能无視人們對一件事情長

13) 馬凌諾斯基著，朱岑樓譯，《巫術、科學与宗教》，協志工業業書，1978年，第1頁。
14) 曹春茹，〈韓國崔溥漂海彖中的中國負面形象〉，《当代韓國》，2007年，第98頁。
15) 李守義等，〈中華孝文化与代際和諧〉，《孝感學院學報》，2003年，第85頁。
16) 許愼，《說文解字》，中華書局，2009年，第69頁。
17) 彭鳳平，從“封建迷信”到“非遺”藍皮書，《中國宗教報告2009》，2009年，第1頁。
18) 王光周，〈朝鮮人的歷史觀与中韓關系〉，國際政治研究（季刊），2009年，第45、46頁。

期的渴望，一味地忽視會讓他們心灰意冷。其次，這正應驗了短板理論。即一个水桶到底能裝多少水，不是看桶邊那个最長的木板，而是要看最短的木板，它最終決定桶中水的高度。一个法律有“短板”，會傷害到整个法律的權威。

宦官專權体現的是一个特權階層。有特權階層的存在，注定要對社會的公平正義造成致命傷害。所以，要設法去除特權階層長期賴以生存的土壤，這樣才有可能眞正營造出人人自愛，互相尊重的社會氛圍，增强民族的凝聚力。

科學技術是人類社會賴以生存的不竭動力，長期忽視對于科技發明的鼓勵和支持，會讓社會永无休止地在一个低水平循环。因爲缺乏持久的勇往直前的動力，社會就會因爲越不過一个个艱難的險關，而在那里痛苦地掙扎和艱難地等待下一次可能的突破，逐漸喪失生机与活力。科技發明的广泛應用可以大大提高勞動生産力，改善民生，但当權者不予重視，或者无暇顧及。以致一些先進的科學技術不能造福于民，造成整个社會的落后。

封建迷信如果作爲一种娛樂形式，在沒有違反社會道德紅線的前提下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一味盲信，不顧道德和法律約束，最終注定會浪費社會財富，坑害大批國民，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對于我們民族自醒构成巨大的威脅。因爲這些精神上負面的点撥和引導，要求信徒們十分虔誠地自我安慰，自我譴責，自我犧牲，自我解脫。各种教義總在勸戒：“前世未修好，今生才受苦”。你們要忍啊，愛啊，自我修煉，甘心受罰。誰沒有苦難？知天命，認命吧，等待來世吧。所有這些消极的觀念只能嚴重削弱人們積极向上的意志。曹雪芹在《紅樓夢》中曾對无良僧道做了鞭辟入里、入木三分的批判：“空空道人”一点不空，同樣勢利；至善“淨虛”毫无善念，冷酷无情；腐儒惡吏滿口仁義，人倫喪盡！[19]

歷史文化傳承的這种不均衡對中國社會的發展极爲不利。民間先進的發明創造其實就是科學技術發展的幼苗，是科技發展在初級階段的雛形，一定要小心呵護，多加支持，才會逐漸成長壯大，形成蔓延之勢。及時加以保護和推广，看似意義不大，實則是撬動難以移動的巨石的有效杠杆。相反不利于社會進步的劣俗文化應及時予以制止和糾正，它是蚕食我們建立公平友愛文明社會的可怕蛀虫，會讓我們的社會總有這樣或那樣的疾患。

中國的發展如果眞要走出困境，就一定要革除自身的各种弊端，讓优良的文化傳統能够不斷得以傳承，讓那些不利于人類社會健康發展的陳貴陋習戛然而止，不再流傳。

要讓國法眞正嚴格起來，就要建立人人平等的理念，以法制取代人治，增加法律約束的長期性。就是說一个人是否違反了國家法律，要從一个較長的時間范圍去考察，而不是這件事過去了也就算了，不用說了。這是對法律威嚴的一种褻瀆，因爲事情雖然過去了，但它造成的危害依然存在。不追究就意味着沒有了法律的制約，使法律處于一种有名无實的尷尬境地。在英國愛丁堡的城堡里有很多鐵皮書，里邊書頁應是牛皮紙質，上面記載着英國歷史上對于國家有各种貢獻之人，這是弘揚正能量之重大舉措。對于是否違法，法律的考量也理應如此。中國的法制如若也能從長期的角度進行考量，這种外嚴內松或者嚴而不当的現象也許就能得到根治。違法者在違法時也會考慮自己不要匆忙行事，以致釀成后患。

要眞正重視國民的科技創新与發明創造。要有制度支持和資金保障，允許失敗，讓專利制度的推行容易一些。只要發明創造在實際應用中産生了效益，發明人就能拿到一定比例的酬金。現在很多人發明出來一些東西，結果家産却耗盡了，生存都出現了問題，這怎么可能有利于國家的科技進步？

讓封建迷信僅在娛樂層次存在，作爲人類社會一些文化生活的補充。堅決反對盲信、迷信，甚至利用封建迷信坑人、騙人或致人死亡的事件發生。只有這樣，社會中各种東西的角色才能更加明晰，各自在自己有效的范圍內活動。社會才會進入一种良性循环，出現眞正的和諧。

五. 结论

崔溥的《漂海彔》，是15世紀朝鮮人用漢文撰寫的中國見聞彔，記述了明弘治初年粗略的中國國情，但其中不乏中韓兩國正史記載所欠缺的鮮活史料，堪称“摹寫中原之巨筆”[20]。中國宋朝的大文學家大詩人蘇軾有詩云“不識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宋●蘇軾《題西林

19) 張國品，樹立科學信仰，反對封建迷信，烏有之鄉网刊，2013年，第3頁。

20) 曹春茹，〈韓國崔溥漂海彔中的中國負面形象〉，《当代韓國》，2007年，第95頁。

壁》），能身不在此山，廬山眞面目自然會了然于胸，此句也足以提醒我們應關注崔溥《漂海录》獨特的史料价值。即便如此，崔溥在《漂海录》中有的語言很是明白，有些只是記述而不便于明說，需要我們進一步揣摩其中之意。如果說中國自己的史學家或者文學家所記录的歷史文獻資料有所偏頗的話，那純粹是因爲政治原因，个人偏好或其他不爲人所知的原因，但崔溥作爲一个國外人士，他完全可以超脫于這些紛繁复雜的因素之外，可從另一个全新的也許是更爲客觀的視角去看待整个中國世界。他所看到的也許是對于中華民族自身的持續發展最有用的東西：最應該保持的优良傳統或是最應該摒弃的成規陋習，或是完全有害于民族自强自新的東西。一个民族要强大，要實現自身的健康發展与延續，就必須時刻反省自身的不足，發揚壯大自己的优勢。

参考文献

[1] 金賢德.崔溥飄海登陸点与行經路線及漂海录，《浙江海洋學院學報》（社科版）12，第4期23卷，22, 2006。

[2] 曹春茹. 韓國 崔溥〈漂海录中的中國負面形象〉，《当代韓國》，第4期，95, 2005。

[3] 王光周. 朝鮮人的歷史觀与中韓關系，國際政治研究（季刊），2009。

[4] 宋成有，崔昌源. 從《漂海录》看崔溥的中國觀，中國語文論譯叢刊30輯，中國語文論譯學會, 2012。

[5] 牛雁峰.明代宦官干政對國家經濟的破坏之研究，西北師范大學碩士論文, 2012。

[6] 黃季焜.讓科學技術進入農村的千家万戶--建立新的農業技術推广創新体系，《農業經濟問題》, 2000。

[7] 張國品. 樹立科學信仰，反對封建迷信，烏有之鄉网刊, 2013。

[8] 張柏春. 智慧的回響, 盤点中國古代重要科技發明創造, 光明日報, 2015。

[9] 布魯諾·雅科米.(法：法國國家技術博物館副館長)，《技術史》，北京大學 出版社 2000。

[10] 張宏杰 .《飢餓的盛世》，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2。

[11] 張廷玉等. 白話明史《劉瑾傳》，現代教育出版社, 2011。

[12] 許愼. 《說文解字》，中華書局, 2009。

[13] 李守義等. 中華孝文化与代際和諧，《孝感學院學報》, 2003。

[14] 馬凌諾斯基著，朱岑樓譯.《巫術、科學与宗教》，協志工業業書,197 8。

[15] 彭鳳平. 從“封建迷信”到“非遺”藍皮書,《中國宗教報告》, 2009。

[16] 朴元熇 崔溥《漂海录》譯注，高麗大學校出版部, 2006。

[17] 許敬震, 《漂海录》體現的朝中兩國人的相互認識,《中國研究》Vol.48, China Problem Research Institute, Hankiik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2010.

[18] Jung-Nyeo Kim, “The Contemporary Cultural Interchange between the Joseon Dynasty and Ming Dynasty in the 15th Century: Viewed from Choi Bu's Pyohaerok”, Classics and Interpretation, Vol. 3, pp. 65-98, 2007.

[19] 葛振家，《崔溥<飄海录>評注》,線裝書局，2002。

최 창 원(Choi, Chang Won)

· 국립대만대학 사회학 박사(중국 문화학)
國立臺灣大學 / 社會學 博士
(專攻: 中國 文化學)
· 현재 청운대학교 중국학과 교수
· 관심분야 : 중국문화학
· E-Mail : cwchoi@chungwoon.ac.kr